

中國近代思想研會討論文專輯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容閔的西學與洋務

梁 伯 華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一) 導言

容閔的一生（1828—1912）正是處於中國的大變局，一方面傳統的儒家學說由於西學的衝擊而開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驗，而另一方面，由於環境的需要，中國卻又不得不從西方世界吸取新的知識及技術，以圖奮發自強。

容閔由於自幼即受教育於教會學校，亦曾經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成為中國第一個在美的大學畢業生，而畢業後即回中國參與洋務運動的推展，故其事功向為史家所樂道，容閔亦一向被譽為「中國現代化的開路先鋒」，啓發「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然而，容閔的西學思想及辦理洋務的態度，卻鮮為人知，即有論著述及，亦是語焉不詳，缺乏深入的研究。

本文試圖從容閔受學經過、西學對他思想的衝擊、及他發表過的言論及著述來分析他的西學思想，從而評論他的「全盤西化論」及徹底否定傳統中國文化的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作用。

本文亦試圖從容氏西學思想的角度來衡量及評價他辦理洋務的態度及方法，特別是他任內督促「留美幼童」肄業的表現。本文利用一些在美國發現的有關「留美幼童」的原始資料，重新對容氏辦理洋務的態度及方法作全面的評價。

中國在現代化的起步時，容閔所提出的「西方模式」思想，雖是富於革命性，並在當時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但它的價值取向及所朝的道路卻是大有商榷的餘地，容閔要以「西學」作為中國發展的目標，但對大部份知識分子及當政者來說，「西學」祇能作為一種自強的手段，而不是目標；因此容閔的不為重用，實植根於他的「西學」思想。

(二) 容閔求學經過及西學思想的形成

容閔求學的經過，在他於一九〇九年出版的英文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一生》（中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譯本改名為《西學東漸記》)¹中有很生動及詳細的描述。而美國的兩位學者湯瑪士·勒法格(Thomas La Fargue)²及愛曼德·威菲(Edmund Worthy, Jr.)³亦有叙及。

從各種資料顯示，容閔接受傳統中國教育的機會差不多是絕無僅有，這很可能是影響他毫無選擇性的接受「西學」的原因之一（他的中文程度十分低），另一原因，則可能是由於他的家庭背景及他在少年時代所看見中國落後的一面，從而被西方的「優越文化」深深吸引，因而導致排斥中國傳統文化。

容閔生於貧農之家，⁴沒有機會接受傳統儒家教育。然而，由於他們的家位於離葡屬澳門祇有四哩的南屏鄉（廣東香山縣），受對外貿易及西方思想的影響，村民對「西方老番」的猜忌，卻大為減弱。⁵在這種環境之下，容閔的父母，便希望兒子能學習洋文，以便能在外國人的商行謀一差事，所以在他七歲的時候，便送他到澳門郭士立牧師(Rev. Charles Gützlaff)夫人在家中所辦的學校就讀。⁶由於容閔在班中年紀最幼，深得郭夫人的喜愛，而容閔對她亦敬慕不已。在郭夫人諄諄善導之下，容閔開始了學習西方知識的第一課。

但影響容閔一生最深的一個外國人卻是一位從美國來華的牧師森美·勃朗(Rev. Samuel R. Brown)。勃朗牧師曾在耶魯大學受教育，於1839年出任剛在澳門成立的瑪禮遜學校校長。瑪禮遜學校的成立，是當時的廣州外僑社團為紀念第一位到中國佈道的基督教牧師瑪禮遜(Robert Morrison)而成「瑪禮遜教育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及辦學校，「使本地〔指中國〕學童，在他們自己的學校中，學習英文，通過這項媒介，使他們進而得以探求西方的各種知識。」⁷

容閔於1841年進入瑪禮遜學校就讀，班中同學，尚有黃勝、黃寬、唐景星等人。翌年，中國於鴉片戰爭中戰敗，香港割讓給英國，瑪禮遜學校亦遷至香港，容閔也隨之而到了香港，繼續肄業。

勃朗牧師是一有經驗的教育家，其教學方法，據容閔自傳中所述，實與中國的傳統

1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1909.)。中譯本名為《西學東漸記》，由徐鳳石、譚鐵樵合譯，最近（1981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校訂重印。日文版則由百瀨弘翻譯，坂野正高解說，於1969年東京出版。

2 *China's First Hundred* (Pullman, WA.: 1942)。此書有中文譯本，由高岩翻譯，書名改為《中國幼童留美史》於1980年由香港文藝書屋出版。

3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XXX IV. 3 (1965), pp. 265—288

4 有關容閔的生卒年月日問題，可參考高宗魯〈有關容閔的史料問題〉，載《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三期（1980年3月），頁111至116。

5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下作《自傳》），第一章：幼稚時代。

6 同上。

7 La Farque 前揭書，頁18。

教學方法迥異：「勃先生一望而知為自立之人，性情態度沉靜自若，遇事調處秩序井然。其為人和藹可親，溫然有禮；且常操樂觀主義，不厭不倦，故與學生的感情甚佳。其講授教課，殆別具天才，不須遠證，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解。此雖由於賦性聰敏，要亦閱歷所致。蓋當其未來中國、未入耶魯大學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的經驗矣。故對於各種學生，無論其為華人、為日人、或為美人，均能審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師莫若弟，以才具論，實為一良好校長。」⁸

但容閔接受勃朗的教育，時間並不是很長，因勃朗的健康情況欠佳，於1846年便決定回美。臨行前，徵求願赴美繼續學業的學生同往。時容父已逝世，容母初不允容閔赴美，後因勃朗利用教會的關係及捐款，允負責容閔一切留美費用，同時給予容母至少兩年的生活費，所以容閔終於有機會赴美留學，同行學生中除容閔外，尚有黃勝、黃寬兄弟。⁹

1847年1月4日，勃朗一行由廣州出發，乘船前往紐約，三名中國學生的旅費，是由廣州外國人士所共同捐助。

從1847年到1854年容閔留美受教育的這段時間，對他的思想及文化的選擇有決定性的影響。可以想像得到一個年方十九的中國青年，離開積弱、貧困、及受帝國主義侵凌的祖國，到美國繼續學業，在彼邦所見所聞，心靈及思想上受到的衝擊及震盪會是何等樣之大！從現存的珍貴資料顯示，一向缺乏傳統中國教育的年青的容閔，到了美國以後的短短幾年，他對西方的文化取向，便由歌頌而到了認同，最後，更認為中國若要自強，必須放棄一切傳統文化，以「西學」作為手段及目標，徹底的改變，全盤的西化，這樣中國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容閔抵美後，便進入麻省的孟松中學（Monson Academy）繼續學業，到1850年畢業才進入耶魯大學就讀。時孟松中學的校長為曾在耶魯受教育的海門牧師（Rev. Charles Hammond），對容閔特別照顧，因此容閔在孟松雖是短短兩、三年，但已為西方教育所深深吸引，而開始對中國傳統有所擲揄。他在孟松就讀時寫給一位在香港時認識的朋友畏三衛（Samuel Wells Williams）便是這樣的說：

——當然你是會覺察到我不會離開我家人的感受，因我曾答應他們我將會在兩、三年之內便回中國。但你很清楚中國人的偏見及對事的誤解，由於心智尚未啟蒙，他們不可能像你一樣能看得出能接受教育的目標、好處、及價值。無知與迷信已蒙蔽了他們的心靈，他們又怎可以看得出〔接受西方教育的〕價值？（1849年4月15日）¹⁰

8 《自傳》，第二章：小學時代。

9 同上。

10 此信現藏於耶魯大學的史特令紀念圖書館（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顯微膠卷）。

在同一信中，容闕對畏三衛更進一步表示，由於他被美國式的自由教育所吸引，他差不多已決定要留在美國攻讀大學。但攻讀大學的學費和雜費則尚未有着落，幸喬治亞州的薩伐那婦女會（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從勃朗牧師處得悉容闕的情況，答允資助。¹¹容闕即赴康州的新港（New Haven），考取耶魯大學的入學資格，所以從1850年開始，也就是他二十二歲的那一年，容闕便在耶魯的校園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涯。

如果孟松中學能給予年青的容闕在思想上那樣大的衝擊及西方教育上的認同，那麼耶魯大學給予容闕在思想上的啟迪及影響，更是無法衡量了。他進入大學不久，便喜沖沖的給畏三衛這樣的寫道：

大學生活對我來說很新穎，雖然它嚴格的操守的滋味我在〔孟松〕中學時便已先嚐。這裏的一切事情在任何時間都很有規律及有責任性，這是訓練一個經世致用的人的最好方法……古舊的耶魯校園是被一股進取心的氣氛所圍繞……我從來沒有接受過這樣的心靈衝擊，我實在十分享受這樣的影響。（1850年12月25日）¹²

容闕在耶魯大學肄業的四年間，讀書很是用功，而預想中的經濟困難，也因他自身的苦幹，而漸改善。他像其他美國學生一樣，在校中學舍擔任幹事，而得免費食宿，又負責採購庶務，並在飯廳中工作。他在大學二年級時，兩度獲得英文首獎，因而在耶魯重要文學社團——兄弟團結會（Brothers in Unity）擔任副書記。¹³

容闕在耶魯的學業表現並不很突出，但他得到同學的敬愛，也成為校中知名之士。他適應性很強，1854年，當他從耶魯畢業時，他已完全「美國化」了。1852年，他已歸化入美國籍，同時亦已信奉了耶穌教義，也把美國作為第二家鄉了。¹⁴

從上可見，到他大學畢業時，容闕在思想及心態上已完全認同了西方的價值及文化。他覺得中國人「無知」、「迷信」，及有「偏見」。他認為西方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方法。概而言之，他覺得西方文化比中國文化優越。一如他在自傳中所說，中國若要富強，中國人一定要受「西學」來啟蒙：

蓋既受教育，則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範圍亦廣，遂覺此身負荷極重，若在毫無知識時代，轉不之覺也……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予後來之事業，蓋皆以此為標準，專心致志以為之。溯自1854年予

11 《自傳》，第五章：大學時代。

12 同註10。

13 《自傳》，第五章：大學時代。

14 Worthy 前揭文，頁270-271。

畢業之時，以至1872年〔中國有第一批留學生之派遣〕，則此志願之成熟時也。¹⁵

由此段可見，儘管容閔的文化取向是西方的模式，然而在耶魯的日子裏，他關心中國的前途，對中國的現代化欲盡一己之力。他認為中國唯一希望在放棄古老哲學文化，而儘速吸收西方科技文明。欲達成此一目的，中國政府當精選年輕子弟前往歐美留學。

很明顯，容閔在美國接受的西方教育，一方面使他感到有「優越感」，而另一方面，也使他產生一種「時代使命感」。他說：

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此痛苦與壓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轉毫無感覺，初不知其為痛苦與壓制也……既自命為已受教育之人，則當日夕圖維，以冀生平所學，得以見諸實用。此種觀念，予無時不耿耿於心。¹⁶

容閔回中國後就促滿清強吏派遣學生赴歐美留學，實在也是受這種「時代使命感」的驅使。容閔的構想是派中國學生長住歐美，接受教育，並徹底吸取「西方觀點」，再將這些「西方觀點」及所學之長技帶回中國，把新中國重建在「西學」上。

（三）西學的實踐：容閔與洋務

容閔於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後，於同年年底（11月13日）從紐約啟程回中國。其實當時容閔已取得美籍，應可長期居留美國，但他毅然回歸貧困積弱的祖國，可見他有積極改善中國的決心。

容閔歸國以後，即着手計劃如何改造中國，而其計劃之實現又以派遣留學生赴美為最重要。這計劃的實現過程困難重重，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的政治及文化環境是保守主義抬頭，加上中國傳統上以文化優越自居，派遣學生赴歐美學習即等於是承認「蠻夷」文化的優越性，這觀念尚未為士大夫及政府所接受。此外，當時正值太平天國內亂，清政府正疲於奔命鎮壓起義，無暇顧及容閔的建議。即到了太平亂平定及洋務運動的開展，「西學」亦祇限於在中國國內吸收，請洋人來中國或翻譯西書，而沒有實行派遣中國學生赴外學習，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870年代才起了變化。

基此之故，容閔初回中國，很難實現其抱負。加上他的中文程度已大大倒退，又只有外國學位，即使容閔有一腔熱血為中國現代化作出貢獻，他也不大為時人所接納，一如一位當時人的記錄：

在中國沒有甚麼需要他〔按：指容閔〕去做的事。那裏除了微賤的親屬外，他沒

15 《自傳》。第五章：大學時代。

16 同上。

有朋友，不會給他任何地位和照顧……他在本國人當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視、猜疑和敵對。擺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陰郁險惡的前景。¹⁷

在這種情況之下，容閔祇能擔任一些閒散的工作，例如在香港任美國領事的書記、在上海任海關翻譯、及任英商寶順洋行（Dent and Company）書記等職。此外，亦曾替曾國藩去美國購買機器，但留學教育的建議，則苦無機會上陳。其實容閔亦曾謁見過太平天國的干王洪仁玕，可惜容的幾項建議亦不為所納，容閔很表失望。¹⁸

關於派遣學生赴歐美留學的意念，實非僅出自容閔。容閔在他的自傳中及後來一些史家誇大了他在這方面扮演的角色。其實當時在野的如馮桂芬，當政的如恭親王奕訢及李鴻章，¹⁹在洋務運動剛開展時便曾考慮到派遣留學生赴外的可能性，但由於當時守舊派反對力大，加上洋務派對在國內興辦的「西學」教育及設施寄望又大，所以派遣學生赴外的意念結果沒有付諸實行，直到後來容閔的教育計劃建議得以上達，而在國內舉辦的「西學」教育又不見有顯著成效後，這個意念又再重新被討論及考慮。

容閔教育計劃的得以上達，是因為得到江蘇巡撫丁日昌的支持，但過程還不是很順利。在1867年當容閔於蘇州謁見丁日昌時，容即勸其推行新教育計劃。丁着容草擬條陳，由他請軍機大臣文祥代奏。容閔即擬條陳四項，其中第二項即為其新教育計劃：

中國宜選派穎秀青年，赴洋留學，以為國家儲備人才。其方法可先定學額一百二十名試辦，分四批按年遞派，每年三十名，學齡以十二至十四歲為限，各生以留學十五年為限。派出時並須以漢文教習同往，因幼年學生在美，仍可兼習漢文。至於學生在外國膳宿入學等事，當另設留學生監督二人來管理。至於留學經費，可於上海關稅項下提撥數成充之。²⁰

容閔所列條陳雖分四項，但自傳中謂重點所在，則為此第二項之教育計劃。但是當時文祥剛丁母憂，條陳遂不幸被擱置。

到了1870年，以天津教案發生，曾國藩與丁日昌奉命前往調停，容氏亦隨丁北上作譯員。在此情況下，容閔利用這機會促丁日昌向曾國藩會奏教育計劃。也就是在這種機緣之下，容閔的建議終於上達清廷，而導致於1872至1875年間清政府的遣派幼童赴美留

17 Joseph H. Twichell 牧師於1878年4月10日在耶魯大學法律學院之演講。附錄於《自傳》中。

18 參見《自傳》各章。

19 《籌辦夷務始末》，卷十五，頁31—34；卷二十五，頁9—10。又《海防檔》，機器局（1），頁13—21。

20 《自傳》，第十六章：予之教育計劃。

學。關於這方面的詳細情形，筆者已另撰專文敘論，這裏不再覆述。²¹

值得在這裏分析的是：清廷之所以接納容闈的建議，決定派遣幼童赴美留學，其目的祇是希望能加速及更有效地學習西技，希望這批學生學成回國後，對中國的自強運動有所貢獻。自強運動就是一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當時洋務派的精神及準則，因此派遣留學生赴美祇是希望能更有效更快地學習西技以自強，是一種手段，而非欣賞西方文化、承認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因此，除西技外，清政府並不希望派去美國的一百二十名官學生吸收其它的「蠻夷」文化及把它帶回中國。

基於此故，幼童雖身在美國，學習西藝，但仍得要同時接受中國傳統教育，因有若干名漢文教習隨同幼童赴美，提供幼童予中文教育，希望幼童的語言、文化、及意識形態不會因身在異域而有所改變。為此之故，清政府還不惜動用鉅款（時約美金四萬三千元）在美國設立校舍提供幼童予儒家教育。幼童還得要學習儒家禮節及忠君思想，近人顧敦錄收集幼童在美時所作的中文課業，發現他們所接受的教學密集而又艱深，²²足證清政府要幼童「中學為體，而學為用」的目的。

然而對於容闈來說，一如前述，「西學」對中國的改良，不單是一種手段，而且也是目標。他要中國放棄舊傳統，朝西方的模式來現代化，這就等於是「西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來建立新的中國。他希望留美幼童能在美期間盡量吸取西方的「優越」文化，待他日學成回國，將西方文化的種子散播到中國國土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²³——這是容闈對留美幼童的期望。

事實上，從1872到1881年容闈任幼童出洋肄業局留美幼童副監督期間，由於他對美國的環境及教育制度熟悉，他對幼童着實有着無比的影響力。整體而言，他對幼童教育的方法，與他本人一貫的「西學」思想相配合。幼童一到達美國，容闈便把他們分配到不同的美国家庭寄居，以便他們能學習及吸收西方的文化，這實在與清政府的原意相違。²⁴

幼童由於年紀小，又沒有和其它中國幼童一起生活，而且一開始便進入美國學校受教，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們很快便適應了美國的生活。不單如此，在很短的時間內，幼

21 Edwin Pak-wah Leung, (梁伯華) "Educ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Genny Lim (ed).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San Francisco: 1984), pp. 203-210; Edwin Pak-wah Leung, "China's Quest from the West: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Asian Profile* 11.6 (December 1983), pp. 527-534

22 顧敦錄：〈百年的留美教育的回顧與前瞻〉，載《教育與文化》，第八卷第一期，（1955年6月），頁4-14。

23 同註15。

24 根據幼童之一的溫秉忠回憶錄：“Reminiscence of a Pioneer Student”是於1923年12月23日於北京的海關學校演講稿，副本現存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圖書館，該館亦藏有不少研究容闈的資料。

童「美國化」的程度，使美國人也驚訝不已。在教室裏，幼童們很快便熟悉了英語；在球場上，他們也敢脫下了絲質的官式長袍，向美國學生挑戰。²⁵

起初，幼童規定必需穿長袍和結辮子，頗似女孩，美國同學均哄笑叫他們做中國女孩！這種嘲笑，令不少幼童決定穿西裝，這是容閔及「幼童出洋肄業局」正監督陳蘭彬意見衝突之開始。容閔瞭解幼童之苦衷，始終表示同情，但陳蘭彬認為脫下象徵中國士大夫的長袍，令人匪夷所思。幼童也想剪去辮子，但清政府嚴令禁止，因為辮子是忠君愛國的象徵，這事也做成正、副監督之間更多的衝突。²⁶

最大的衝突，卻是在於幼童的中文教育方面。由於幼童對美國一切的全面接受，使他們對中文課業的學習，益增困難。容閔贊成完全與中國習俗隔斷，幼童對中文課業的荒疏，他不以為異，未思糾正，而且還經常對幼童袒護²⁷。容閔這種態度，使「幼童出洋肄業局」遭受到局內委員及中國國內保守派最嚴厲的指責及攻訐，最後，該局於1881年被撤消，幼童們學業來完成而被召回國，此點實為重要原因之一，容閔本人應負大部份責任。

關於容閔對幼童的教學方法導致幼童的提早被召回，可從最後的一位監督吳嘉善對容氏的控訴中看得出來：

任其放蕩淫佚，並授學生以種種不應得之權利……耑好學美國人為運動遊戲之事，讀書時少而遊戲時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種秘密社會，此種社會，有為宗教者、有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當之行爲，坐是之故，學生絕無敬師之禮，對於新監督之訓言，若東風之過耳，又因習耶教科學，或入星期學校，故學生已多半入耶穌教……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²⁸

李鴻章在1880年5月10日給「幼童出洋肄業局」前任監督陳蘭彬的信中，也提到容閔對幼童的中文教育不重視的這一件事：

容元甫〔按：即中文教習容增祥〕來謁，言學徒拋荒中學係屬實情，由於純甫〔按：即容閔〕意見偏執，不欲生徒多習中學，即夏令學館放假後，正可溫習，純甫獨不謂然。²⁹

25 參註21所引拙文。

26 同上。

27 同上；又可參考 La Fargue 前揭書，頁45—46。

28 《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頁36。

29 《朋僚函稿》，卷十九，頁20。

留美幼童的提早被召回，固不單因幼童的過份「美國化」及荒廢中文教育所致，³⁰但這無疑是主要的原因之一。「留美幼童」原來的計劃是要幼童祇學西技，而非其它的「蠻夷」文化；要熟讀四書五經，學習內聖外王之道。然而由於容闈的鼓勵，幼童們的「美國化」程度使清廷震驚，蓋因原本的計劃已破壞無遺，至此，幼童之遣回，已成必然之勢。儘管容闈運動美國的政學界知名人士向清政府施壓力，³¹亦是無補於事，於1881年9月6日，「幼童出洋肄業局」終於被撤消及幼童不得不離美回國。這件事對容闈的理想及抱負實在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四) 結語

容闈的「西學」思想與他的「洋務」事業，在晚清的政治環境中可以說是相輔相成，而同時亦互相排斥。

容闈由於接受的是徹頭徹尾的西方教育，始終信服西方文化的優越性。他在得到教會人士協助的這個機緣，赴美國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目睹西方社會的自由、科學化、及富強的現象，使他對西方文化可使中國振興的想法深信不疑，而且躬身力行。

然而，容闈對西方文化卻是毫無保留地及毫無選擇地接受。他鄙夷中國文化，覺得它是使中國落後的原因。他認為中國若要強大起來，一定要放棄舊傳統，一心一意的接受「西學」，以西方及「西學」作為現代化的模式。他本人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以及文化認同，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模式。對於中國的現代化，他的主張可以說是「全盤西化論」，也就是說，他希望看到一個以「西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中國。這在他那個時代的中國來說，就是對思想比較進步的洋務派而言，還是匪夷所思，不能接納的。

清末洋務派推展的自強運動，實質上還是一個保守性及妥協性的運動。他們雖承認西方技藝有效性，但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相對優越性，卻是毫不懷疑的。他們是要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學」祇不過是自強的手段，而不是目標，這與容闈的想法及信念是大相逕庭的。

然而，對洋務派而言，由於容闈對「洋務」有切身的認識，所以他還是有被利用的價值。他被任命為「幼童出洋肄業局」副監督，就是因為他對美國的環境及西方的教育制度有深切的認識（相信當時中國沒有另一個人比容闈更為勝任該職），從這點來看，容闈的西學與洋務，是相輔相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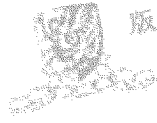
30 當時美國有所謂「排華運動」，清政府抗議不得要領，亦有考慮以召回留美幼童作為一種抗議。

31 包括前美總統 Ulysses S. Grant，名作家 Mark Twain 及其它政學界知名人士，參見《自傳》，第十九章：留學事務所之終局。

但是，相輔相成以後跟着來的，卻是排斥的一面。容闈是要把西方文化全盤的介紹給中國，而不單祇是科技上的學習。他希望藉着幼童在美國留學的機會，盡量學習西方的文化，而不重視他們的中文教育。容闈的意思是要幼童學成回國後，能作為一個文化傳播的媒介，把西方的文化移植到中國的國土上來。但他這個教育幼童的方法，卻自然而然地招致儒學之士及最後包括洋務派的指責及攻訐，而導致留美幼童的撤回。「幼童出洋肄業」事件所引起的中、西學的衝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實在是近世中西文化論爭的開始，比五四時代還早了半個世紀！

容闈由於西方教育及背景的影響使他尊西學而黜中學，對西方作出文化上的認同，但他始終是念念不忘他的祖國。他雖是入了美籍（1852年），也娶了美國太太（1875年），而且把美國作為他的第二故鄉，但他愛中國之情卻是一貫的。姑無論他的西學理論在中國是否可行及會否為人接納，但容闈言行一致地為中國的現代化努力耕耘。他為了要實現他改良中國的計劃而四處奔走，從謁太平干王到為清廷效力，從維新運動到革命運動，³²容闈都不斷地在尋找機會來替自己的祖國服務。若論容闈為一機會主義者，倒不如更貼切的說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的愛國主義已超越一切政治集團或政權，相信在這方面不少中國的知識份子還是要以容闈作為榜樣！

32 參考《自傳》，第二十二章：戊戌政變；又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一書中之第四章：最早自香港留學美國之容闈及其所倡之洋務；Key Ray Chong,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orm and Revolution, 1898-1922*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又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藏有容闈與 Homer Lea 及 Charles Boothe 的通信。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Americanized Jung Hung and his Career in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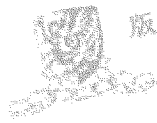
(A Summary)

Edwin Pak-wah Le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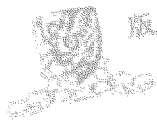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Famous in history as the first Chinese graduated from an American college (Yale, 1854), Jung Hung (1828-1912) served China with much dedication and patriotism. However, Jung's cultural orientation was one that of the Americanization of China. The Western knowledge that he acquired while studying in America greatly influenced his perspective on China's future, as can be seen in Part I of this paper, which analyzes Jung's Western knowledge and his ideas on Confucianism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Part II goes on to demonstrate how Jung's Western approach differs from the Self-strengthening leaders', particularly in the case concerning the education of 120 Chinese pioneer students in America. Jung Hung's conflict with the Confucian officials, in retrospect, was inevitabl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numerous Chinese and Western sources, including the materials now deposited in the libraries at Yale and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